

[英]戴维·马格利斯*

赵敏 译

文学与政治判断

[摘要]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文章批评常常被人讽刺说局限于简单的判断——“它是不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本文对不同时期的两部作品的分析，证明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只有在对作品创造的价值和作品中的虚拟现实与读者经验如何联系进行具体考察之后得出结论，这个问题才有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政治判断

马克思在他的《费尔巴哈提纲》的第11条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者们对于如何进行改变的看法经常太过狭隘。他们或是把文学认为是贩售给同志们的出版物,或是仅仅把它当作一种消遣。我们知道,政治的触角延伸至生活——一个人的也是政治的——和文学的所有领域。即使它被认为**只是**一种娱乐,它也可以并且**确实**具有政治影响力。

真正的问题在于,“文学是政治的”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以及文学如何扮演积极的政治角色。在最简单的意义上,人们通常认为,具有深刻政治洞察力的文学作品能够引导读者走向左翼。但是政治上的反应比这要复杂得多。人们行为的理由,例如投票,是从包含不同事物的众多因素中得出的。他们的观点或许反映了大众媒体传播的内容,或许和他们朋友们的观点一致,又或许是对Facebook和Twitter 上一些内容的反应,也受到包括个人体验和经历在内的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的观点和行动是非常复杂的过程的结果。在这些过程中,他们的阶级位置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期望一位工人阶级的人投票给工党,而只告诉他们工党是“为了多数人,而非少数人”,这种行动过分简单化,并且从政治上来说也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明白,为了克服媒体对于左翼价值观的持续破坏,以及他们统一起来对抗工党的运动,我们的行动得开始的慢一些。换句话说,我们不能一开始就提出我们想要看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景象——在流行的观点里,社会主义不可能成功,是应该被拒绝的——而是应该从日常生活物质的关注点开始,例如住房和教育等。问题不在于我们社会能不能负担得起它们,而是,作为社会的

* 戴维·马格利斯, 艾塞克斯大学博士, 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荣休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莎士比亚研究及考德威尔研究。

一个部分，他们是否被认为是一项权利。撒切尔夫人最具代表性的名言是：“没有社会这样的东西，只有个人和他们的家庭。”她所有的消极行动中影响力最为持久的，就是推动了个人主义思想和个人利益的关注而不是社会福祉。“我的汽车，我的孩子，我的公寓（以前是公营公寓）。”想要超越这样的信念——所有的一切都始于个人——是一项根本性的政治任务。我们必须劝告人们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要进行这种劝告，首先要认识到，那些说着反对的话语的人们，本身并不一定是敌对的。他们或许会关注一些事物，对于那些事物来说，他们认为社会解决是必要的。这就使他们有了具有政治积极性的潜在可能。人们的选择是复杂的。不是那种夸夸其谈的自由主义，它需要辩证的思考——这也是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遗产的一部分。

我想以两个文学作品作为例，来说明一个看上去完全非政治的过程是如何鼓励政治态度的形成的。第一个例子是一篇短篇小说，罗伯特·格林的《潘朵斯托》（1584）。这篇小说在它被创作的时代是最受欢迎的文学作品之一，但是现在已经鲜为人知，即使是各大学的英语系也没有充分地重视它。它现在还没有从英语研究领域消失是因为莎士比亚，他在作品《冬天的故事》里大量运用了从《潘朵斯托》中得到的灵感。莎士比亚还在《暴风雨》中对《潘朵斯托》进行致意。《潘朵斯托》的情节建立在传统民间传说主题的基础上——一个生于皇家的婴儿被放在小船里顺水漂流，被一位寻找走失绵羊的牧羊人发现。这个婴儿在贫穷中长大，成为一个牧羊女。在对自己身世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她受到了王子的追求。阶级间的关系成为这部作品的中心问题。在格林写作的时代，等级制度被认为是当时的社会秩序的根本原则。人们认为那些触及界线的人必然会遭受失败，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教堂以及大部分文化中告诉人们的。格林对它的描写只是夸夸其谈。芳妮娅，从小被抛弃的女主角，告诉王子他们不能结婚，因为所有的一切都会反对他们。但是她又列举了一些希腊神话中的反面例证——爱情是不可抵挡的神——于是这对小情侣就私奔了。他们被抓住，却逃脱了惩罚。因为老牧羊人拿出了他当时在婴儿身上发现并藏起来的珠宝，证明女主角其实是一位公主。阶级障碍不复存在，王子和失而复得的公主因此可以缔结婚约。

人们普遍认可的对于《潘朵斯托》的批评，认为它实际上并没有反抗等级制度，因而故事中的行为才被接受。因此，人们认为这个故事承认了现状和等级制度的重要性。但是，小说的大部分篇幅以现实的笔触描写了芳妮娅的农民地位以及社会不公的状况（他并没有透露任何有关芳妮娅公主身份的线索）。王子多拉斯特斯不理睬芳妮娅的抗拒，并且利用他的身份和地位来达成自己的意愿：“你必须服从我，因你知道我可以命

令和强迫你。”芳妮娅回答：“你不能强迫我爱你，强制来的是压迫，而不是爱。”她可以爱他，她说，“当多拉斯特斯成为一个牧羊人。”格林在这里设计了一个喜剧景，多拉斯特斯穿着一身牧羊人的装束出场，宣称他已经完成了使她爱他的要求。芳妮娅对此的回答十分机智，既通俗又充满了文采，“牧羊人之所以被叫做牧羊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带着钩子和包，而是因为他们生来贫穷，只能靠牧羊生活。所以这样的打扮不能把多拉斯特斯变成一个牧羊人，而只是看起来像一个牧羊人。”当芳妮娅接受了多拉斯特斯，他们充分认识到他们的行为反抗了世俗和等级制度的权威。

故事的情节建议人们遵从习俗，因为故事的幸福结局是建立在习俗被服从的基础之上的。然而，格林对于等级制度的挑战并不是通过情节来实现的。情节只是工具，而不是故事的核心，也不是格林在小说中生动描写的。他给予最多考虑的，是人物的动机，即人物行为的根据。对于人物和动机的强调将故事的重心放在了读者经验上。这也就是说，尽管故事的情节坦白来说非常荒谬，但是主要角色的行为却可以和现实生活勾连起来，清晰可辨。芳妮娅无疑是最重要的角色，不仅仅因为她所占的篇幅最长，也因为她是判断形式从而作出决定的那个人。格林在这里完成了一个双重挑战：他赋予一个女性最为重要的角色（他在几乎所有的小小说里都是这样做的），行动是通过芳妮娅的视角展示出来的。她衡量了社会规范和她自身的意愿，结果是她的意愿决定了行动的进行。在这里格林将个人判断置于习俗之上，并且承认了男女平等（托马斯·纳什尔称他为“女性的荷马”）。

当然，《潘朵斯托》中的人物只存在于虚构的世界里，但是这个虚构的世界却反映了读者们所在的真实世界中的社会秩序。小说中关于个人选择的叙述是如此地有力，更重要的是，它是可以借鉴的。它的说服力来自于态度，而非信息；格林提供了一个个人主义合法化的语境。实际上，他帮助读者修改了社会从众性与个人意愿之间的情感平衡。个人主义不再被当作罪恶的根源，具有反社会功能的东西。格林向资产阶级提供了个人主义这一**社会赋权**。

我认为有必要强调，格林的“合法化”并不是理性的论证。那些期望看到通过推理实现政治劝导的读者，通常不会意识到格林具有的潜在的政治功能。这一点也是我想要做出的政治判断：政治功能并不常常依赖于显在的政治立场。马克思欣赏巴尔扎克——不提他的保守主义——欣赏他的小说中展现出来的对于法国资产阶级社会机制的理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性的理解。让我们更确切些，格兰西论述了工人阶级对于报纸

连载的《铁面人》的喜爱，他说这种喜爱并不是因为英雄的贵族地位，而是他与不公正的斗争，与他们能够分辨的目标的斗争。重要的——也是我所关心的——不是作品中提供的信息，而是一部作品影响读者导向的力量。

我想用儿童书籍作为第二个例子。它们是展现态度塑造的绝好材料，因为它们之中表现的行为模式非常清晰。现代的儿童书籍也很少将传授知识作为主要目的。然而很多人，甚至那些致力于协调意识形态差异的激进主义者，也认为它们并不重要。他们或许认识到儿童花时间阅读的重要性，但却对书本中传递的价值观无动于衷，并不认为挑选书籍是件大不了的事儿。小说的本质是创造想象中的人物和环境，但是无论小说多少虚幻，它们与现实生活中的行为都有一定的关系。事实上，它们测试了行为模式。阅读小说就是实验用不同方式的行为具有怎样的意义。因为儿童关于世界的经验必然是有限的，小说中的行为模式很可能对他们产生比成年人更大的影响。

我将从我的个人经验出发进行阐释。我的一个女儿在三四岁的时候，有一天从托儿所回到厨房和我聊天。我当时正在准备晚饭，她问我我的朋友瑞克有没有结婚。我说“没有”，她的回答是“可怜的瑞克，没人给他做晚饭了”。她到底是从哪里学到这种性别角色的概念的？当然不是在我们家里。托儿所讲给他们的故事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性别差异。

我想分析的儿童图书是非常著名的《野兽家园》，莫里斯·桑达克1963年的作品。桑达克不仅撰写了故事，还画了插图。这些插图包括了建筑和装饰的现实主义元素，它们更多地是提供了一种感觉，而不仅仅是照相写实主义式的线索。插图的色彩柔和，给读者一种印象而不是物质现实的鲜明写照。陈设和环境的描绘使用的是钢笔画，读者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只是图画。其效果是告诉读者，这个故事具有**现实性（real-ish）**，而非本身就是现实。

麦克斯快要六岁了，而故事的开端就具有一丝恐怖色彩：“那天晚上，麦克斯穿着他的狼皮衣服，做这样那样的恶作剧。”这些恶作剧里还有一些家庭语境中显然无法接受的行为——例如把钉子钉进墙里和吓唬小狗等。“他的妈妈叫他‘野兽’，而麦克斯回答她‘我会吃掉你！’他被赶到床上，并且不许吃晚饭。”这里的插图是一个正在发脾气的男孩——气愤却带着一丝反抗世界秩序的满足感。在传统的看法里，对他的惩罚是把他从世界中部分地隔离，被赶到床上，且没有晚饭。他愤怒的态度表达了他的反抗——他没有压制愤怒的情绪，而仍然拒绝接受社会对他的行为的评判。

然后他进入了梦中的世界：“那个晚上，麦克斯的房间里长出了一片森林。森林不停地长啊长啊，直到他的屋顶被顶起挂在葡萄藤上，而他的墙也消失在了周围的世界里。”

“旁边还有一片海不停地翻腾，里面还有一艘给麦克斯的小船。他穿过日夜，穿过星期，穿过一年，来到了野兽们生活的地方。”时间和空间的混合（穿过星期）强调了想象中的位置。作者画出的野兽看起来有一点像中世纪描写中的魔鬼，但是带着一些儿童图画圆圆的特征。“它们吼叫出可怕的声音，露出可怕的牙齿，转动着可怕的眼珠，伸出可怕的爪子”，但是麦克斯“用‘一眨不眨地盯着它们的黄眼睛看’的魔术”驯服了它们，它们“把他当做所有野兽的王”。

这时，桑达克让麦克斯说：“让野兽们暴动起来吧！”这些生物，部分地是可辨认的动物，但却拥有幻想中的巨大的爪子和角。这些生物上蹿下跳，看上去非常危险，又带有一种嬉戏感，这使它们显得不那么可怕，还产生了某种吸引力。对“野兽暴动”的描写用了六页——不是用文字，全部都是插图——直到“麦克斯喊‘现在停下’，他把野兽们赶回床上，并且不让它们吃晚饭。野兽之王麦克斯有点孤单，他想到一个有人最爱他的地方。”他卧室的现实在这里像气味一样挤了进来，“这时，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了美味食物的味道，所以他放弃了做野兽世界的王。”野兽们恳求他不要走，但是麦克斯和它们挥手说再见，“往回航行，穿过一年，穿过星期，穿过某一天，到了他自己房间的那个晚上。他在房间里发现了自己的晚饭，还是热乎乎的。”

显然，这个故事并不包含政治性的内容，但是它表现出来的态度却很重要。麦克斯作为个体所经历的挫折和愤怒把他和家中的社会环境疏远起来。但是通过来到野兽世界，他的愤怒逐渐消除，他意识到自己想要重新融入到环境中去，得到别人的爱。这个故事的重点（这里用“重点”有些过于明确了，桑达克并没有提供一个清晰的结论），是要说社会融合是积极的。这个意识更多地是通过插图表现出来的。这个故事指出，人有时候会经历情绪爆发。如果在他们生活的环境中，他们重返社会是可能的，情绪爆发就是可以接受的。在我们今天所处的，越来越个人化的环境中，任何能够加强社会情感的事物都是积极的，因为它们增加了人与他人之间的互动。它还具有政治上的积极意义：人们必须认识到，如果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的话，社会人的存在是最根本的。撒切尔让大多数国民树立了个人主义是正常模式的观念。在《野兽家园》这本书里，对于桑达克来说，社会人才是正常的模式。这是一个用非政治的艺术手段达成政治效果的绝妙例证。

至于文学，我想马克思早就教过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它的效果可以被理解为是政治性的——这种政治性是指所有想象性的重建和经验的构成都包含了社会人的原则。因此它的政治判断是恰当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这并不是要给文学划一条线。这种控制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幌子下进行，其结果是消极的。事实上，它要求作者们展现积极的政治成果，那些简单地表现政治化过程的作品被判断为不充分的。文学可以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的一部分，因而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对它进行批评。但是要想使这项工作真正地有用，我们必须认识到人和人类进程是非常复杂的。

（编辑：冯仲平）

Literature and Political Judgement

[Abstract]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West has often been caricatured as limited to a simplistic judgement – ‘is it for the workers?’ Through discussion of two works from different periods, this question is shown to have important meaning, but only when it is the conclusion of concrete examination of the values created in the work and of how the fictional reality relates to audience experience.

[Keywords] Marxism, literary criticism, political judgement